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合分成败论

余子侠 王海凤

摘要:“七七”事变后,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下,平津地区的高等院校被迫停办。为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国民政府做出了高校内迁的战略抉择,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等战时联立大学应运而生。西北联大自联立到分设,均受到国联教育考察团、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所以就“联大”身份而言,无论获得与放弃都过于匆忙,但此校的设立,不仅在特殊时期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保留了血脉,且为战时及战后西北地区的教育事业尤其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国立;西北联大;合分;成败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8)03-0092-09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其前身是由平津地区多所内迁西北地区的高校联合组建的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自成立至解散,存在时间仅1年零4个月,然而该校的迁办,却为西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使得西部地区第一次有其国立大学及高师、高工、高农等高等学府,此举积极影响极为深远。然则既往有关战时联大的研究,多数聚焦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对其也多是褒扬之词,而有关国立西北联大的研究,不仅甚少,且多是批判之言。缘此,本文在爬梳国立西北联大联立与分设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西北联大的“合”因与“分”由,旨在使西北联大于西北地区教育发展中的贡献得以呈现。

一、国立西北联大的联立与分设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华东等地的高等院校狂轰滥炸,一些校园几成废墟,地处

平津等地的高校纷纷被迫停办。为了不让日寇毁灭我国高等教育的毒计完全实现,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的火种,在教育界享有厚望的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等102位学人联合发声,强调“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要求国民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将部分高校迁往内地续办。随后,此请得到国民政府的应允,国立西北联大也应时而生。

(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联立

“七七事变”后,为使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流离失学,同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国民政府决定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为此,1937年8月,教育部拟定《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在长沙、西安等地暂先设置临时大学一至三所^①。不久,此设想即开始付诸实践。1937年8月31日,教育部决定在西安设临时大学一所,“令(陕省)教厅觅定地址后,即派员筹备”^②。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育的应变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6BZS066。

作者简介:余子侠,男,湖北蕲春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二级),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史所兼职教授。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王海凤,女,山西汾西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中外教育交流史博士生。从事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

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 设立西安临时大学”^③。10月18日, 西安临时大学成立, 并于当年11月1日正式开学, 15日开始上课^④。

1938年1月, 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部长。同年3月, 临汾失陷, 关中门户潼关吃紧, 敌寇不时侵入西安轰炸。其时, 国民政府中一些片面抗战论者和复兴社人物借此时机极力主张西安临大迁校, 此议与国民政府教育当局的主张相符。教育部以“为维持学生的学业起见, 及为国家根本的教育事业起见”为由, 命令西安临时大学迁往南郑一带。尽管多数师生持有异议, 甚至校常委徐诵明还打电话给陈立夫阐明校方意见, 但得到的答复是“强令南迁”^⑤。

正值全校师生南迁就绪, 1938年4月3日, 教育部下发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该方案规定: “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 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 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 提高边省文化起见, 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 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⑥。”随后, 西安临时大学奉部令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且定于4月18日开学^⑦。据其时记载: “该校员生约一千六百余人迁至南郑、沔县、城固及古路坝等四处, 而以城固为大学本部, 共有学生千人左右^⑧。”校常委陈剑脩报告更改校名的意义时言及: “本校现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 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校合组而成^⑨。”

(二)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设

国立西北联大自成立后, 并没有像西南联大一样稳定发展, 不久即出现了分立。西北联大的分立有两次: 其一是农、工两院的分出独立; 其二是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的分开办理。

教育部于1938年6月始议,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 组建为国立西北农学院^⑩。是年7月, 西北农学院筹备委员会即成立, 原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9年4月, 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与之

同时, 西北联大工学院也开始分开设置。1938年7月17日, 教育部长陈立夫发汉教第6074号令: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为国立西北工学院^⑪。”随后, 勘定陕西城固古路坝为该院院址。1938年12月11日, 国立西北工学院开始上课。

西北联大的农学院、工学院陆续独立后, 西北联大仍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医学院与师范学院^⑫四个学院。1939年8月, 西北联大再次改组。据其时记载: “教育部呈请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 采用校长制, 以专责成, 并将西北联大原有之医学院与师范学院一并独立设置, 分别改组为国立西北医学院与师范学院, 使均成为西北高等教育之基础案。”其后, 行政院“决议通过”^⑬。随之,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⑭。根据大学旧制, 必须有三个以上的学院方可称为大学, 由此, 西北大学遂将原文理学院分劈为文、理两院, 连同法商学院共三院, 仍为西北地区最高学府。

1939年8月, 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奉令独立设置, 9月1日,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正式成立^⑮。校址设于陕西城固, 院长仍为李蒸。时隔一年后, 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西北师范学院由城固迁至甘肃兰州, 并规定兰州为该校的永久校址。1942年, 西北师院本院由城固迁兰州, 城固本院则改称分院。截至1944年底, 国立西北师范全部迁往兰州, 城固分院宣布撤销。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几乎同时, 国立西北医学院也从西北联大中分出独立设置, 校址设于陕西南郑。1945年夏, 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 “将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建制撤销, 并入设在陕西的国立西北医学院, 改名为国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⑯。由是,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被教育部横刀一分为五。

二、国立西北联大的“合”因与“分”由

秦汉以降, 尤其汉朝“太学”开办以来, 陕西一直属于全国文教发展的重镇。唐宋以后, 随着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东移及南迁, 西北地区的教育在全国的地位逐渐衰落。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 为发

展中国教育，开始寻求国际上的援助。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保存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同时也为进一步开发西北地区以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根据西北教育现状，接受国联对中国教育发展布局的意见，在陕西成立西北联大。然而，自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西北联大经常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抗日宣传及运动，为防止学生被共产党拉拢，同时为控制西北地区社会稳定，国民政府决定分立西北联大，借以将师生散布到西北各地。其时，西北联大各校之间的内部矛盾，正好成为一个导火索，于是在国民政府的授意下，西北联大宣布解散。应该说，这些即是国立西北联大的“合”因与“分”由。

（一）“国联”对中国教育发展布局的意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走向一直遵循着新型的国际运行轨道，中国的学校教育也依循着国际教育变革发展的走向而不断地变易和改革。尤其在新型学校制度确立后，中国教育事业的变化无不与世界教育的改革潮流相互激荡且归流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难接西欧美日诸国之踵，尤其是经济发展难供各地学校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续。

1931年5月，在国际联盟行政院主持的会议上，中国政府曾以一种改革计划的准备与实施，请求国联专门机构的协作。其后，国联行政院应我国政府请求，由国际文化合作社委派4名专家组成教育考察团^⑦来华考察，“以谋中国教育制度之改进与中外文化之沟通”^⑧。他们于是年9月30日抵上海，在华考察历三月之久，所到之地有“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定县、杭州、无锡、苏州、镇江、广州等处”^⑨。其后，国联教育考察团提交了一份“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对中国教育行政和高等教育等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较为适用的建议。其中，于后来西北联大成立有影响的建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建议现时中国高校同处分设者合并办理；二是现时中国大学布局应进行合理的调整。

截至1931年9月止，“中国现有大学总数为五十九校，大学生三三、八四七人，其国立大学十五校，学生一一、五七二人，省立大学十七校，学生五、九一〇人，立案之私立大学二十七校，学生一六、三六五人”^⑩。考察团认为，此种情形为

此前中国“大学热”时期遗留的结果，“今欲将良好之结果保留，使恶劣之结果消灭，其所需要，不在大学之扩充，而在大学之合并”^⑪。其方法则是，同在一城市内或其附近，若有数个公立大学，教育部应即根据全国大学会议之建议，设法裁剪之。应该说“同处分设者合并办理”的建议，为后来战时联合大学的成立埋下了伏笔。

在中国大学的分布问题上，考察团认为，中国大学布局杂乱无章，同一区域内设立数所大学，所进行之工作又几乎相同，诸大学间亦无合理之分工。如中国高等学府皆集中于北平、上海等地。其后，为使中国大学分布均匀，国民政府借助高校西（内）迁的战时教育应变举措，于云南成立“西南联大”，于陕西成立“西北联大”。随之为避免同一区域聚集多所大学，国民政府又下令分立西北联大，并将分立的各校散布西北各省。由中不难看出，国联的建议确实影响了战时中国大学的布局，成为后来西北联大合分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抗战胜利后时人对战时及战后高等教育的应变与发展进行总结及批评时就有过说明。如其时大夏大学教授欧元怀即言：“抗战以前的大学，确如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指摘与建议，地理分配不合理，学分制有流弊，入学的青年不多。”虽说经过了战时内迁和战后复员的调整，但与“十年前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批评，除了集中趋势的地点有不同外，集中趋势还是一样”。“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⑫。

（二）西北地区学校教育历史发展的现状

清末以降，西北地区即积极致力于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创办，然而经济发展的滞后和文教基础的薄弱，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极少。为了对高校西迁前西北各省区高等教育机构有一个基本的总体性了解，现借助相关史料将清末至抗战前西北各省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创办与变迁情形列表示下。

尽管西北地区近代高等教育的变迁仅以一表示之，但不难看出该地区在清末兴学之初，高等教育起步的势头并不比东部各先进省区滞后，但在后来尤其进入民国之后，愈来愈无发展之力，以致迄于全面抗战前夕，该地区的高校寥寥无几，真正算得上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校，合计不过区区3所：国立西北农林学院、省立甘肃学院和省立新疆学院。即是

表1: 抗战前西北各省区高教机构沿革表

	晚清时期 (1901—1911)		民国前期 (1912—1927)		国民政府前期 (1927—1937)	
	校名	历史沿革	校名	历史沿革	校名	历史沿革
陕西	关中大 学堂	1902年开办, 1905年改为高等学堂; 1912年该学堂改为“西北大学预科”。	陕西公立法政 专门学校	1912年由前清法政学堂改立。	西安中山 大学	1927年设立; “西北大学”停办后, 联军总司令部即着令以西北大学校产、经费改办“中山学院”, 不久又改为“西安中山大学”; 1931年初该校即告消亡。
	宏道大 学堂	1902年成立, 由原味经、崇实二书院归并宏道书院而成, 其后改为“宏道高等学堂”; 1909年因种种原因改为“宏道中等工业学校”。	国立西北大学	1924年由陕西、甘肃合办; 1912年陕西法政学堂改为关中公法大学, 不久以此校校址成立关中大学, 其后, 将“三秦公学”并入, 改为“西北大学”; 1915年遵教部令改为“陕西法政专门学校”; 1923年蔡屏藩等又筹建国立西北大学, 1924年陕、甘联手以国立的名义再次办成西北大学, 后于1927年停办。		
甘肃	甘肃大 学堂	1902年筹办, 《钦定学堂章程》出台后, 改为“甘肃高等学堂”; 1903年秋, 新校舍建成, 改名“甘肃文高等学堂”; 辛亥革命爆发后, 本科、预科全部毕业, 学堂改为“全省中学堂”, 但实际上已停止教学活动。	甘肃法政学堂	1909年创立, 是民国初期甘肃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 1913年改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1926年改设工业专门学校。	兰州中山 大学	1928年2月, 以甘肃法政专门学校为基础改建成立; 1929年改为“甘肃大学”; 其后, 因与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组织法》不符, 1932年改为“省立甘肃学院”。
新疆	高等学 堂	1901年在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创办; 1906年因新任提学使天津人杜子丹“注重实际”, 以其“生徒程度不齐”而改设为“中学堂”。	俄文法政专门 学校	1924年在迪化创建; 但此校到1928年才有第一届学生毕业。	新疆学院	1931年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改名为“新疆俄文法政学院”; 1934年改为“新疆学院”; 1935年1月1日成立。

资料来源: 余子侠, 冉春著: 《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心》,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注: 西北地区各省区还应包括宁夏和青海^②, 全面抗战爆发前, 此两省高等教育一片空白。

说, 在广袤的中国西北部, 这一面积为3549万平方公里、人口计2133万的广大区域^③, 所拥有的高校数在全国108所高校中占比仅有1/36, 即不足2.8%, 而且其办学规模、教学质量和学校档次均处最低层级。抗战全面爆发后, 东部地区相继沦陷, 中国若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不得不将沦陷区的高校迁出, 也可借机改变地域广阔的西北地区高校稀缺的窘况。基于此等原因, 国民政府于西北地区安置国立西北联大, 无疑恰逢其时、适得其地。

(三) 国民政府战时教育应对政策的变化

抗战时期, 西北联大的合分与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的变化有莫大的关系, 甚至可以说, 国民政

府战时教育应对政策的变化是导致西北联大合与分的主要因素。

抗战全面爆发后, 平津等地相继沦陷, 在此特殊情状下, 国民政府迫于战事的发展态势, 在教育政策上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是年8月, 国民政府出台《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 无疑是想借高校内迁, 趁机将一批高校直接收归麾下, 进而更好且更有效地在文教领域控制西北地区。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 做出“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抉择, 其中即包括高校内迁的举措。1938年, 国民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 具体负责全国高校的迁建工作^④。正是在这种政策和措施的实施背

景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院校才得以合组并以“联大”的办学模式而设立。

其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其中提出“农村需要和工业需要并重”的方针。为配合此项方针，教育部将西北联大进行第一次分立，于1938年7月将西北联大农学院、工学院分出独立。自是而后，由于陈立夫大力推行“分区大学制”，而西北联大的存在与“分区大学制”的指导思想不符。故而，1939年3月在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高等教育改进案》中规定：“教育部应斟酌各地交通、人口、经济及文化等情形，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至少设立大学一所”“每一师范学院区，设师范学院一所”“就适当地点，统筹设置农、工、商、医等专科学校”等^⑧。这就为国立西北联大的再次分立奠定了政策基础。

自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西成为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地区，加上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使西北联大“犹如一所战时大学”^⑨，这使国民党当局深感不安。为防止学校成为革命青年从沦陷区到延安的中转站，国民政府受“攘外必先安内”心理定势的影响，更加深了对西北联大的严格控制，毫不夸张地讲，西北联大的发展走向完全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直接掌控在手。这从以下事例可见一斑：1938年9月，徐诵明请辞法商学院院长，并决定聘鲁迅好友许寿裳继任，此消息传开后，进步师生拍手叫好，教育部却深感不满，随即电令西北联大，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按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为教育部任命，各院院长应由校长聘任。此种由教育部直接任命院长的举措，自然引起校内外强烈反对。面对此种现象，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解聘进步教授、开除学生、加紧特务渗透等办法。其后，面对师生愈演愈烈的正义呼声，国民政府竟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宣布解散西北联大。国民政府解散西北联大的决定看似相当随意，其实早在陈立夫极力推行“分区大学制”时，就生发分立西北联大之心。可见，国民政府对西北联大控制之强及分立之举蓄谋之久。

要言之，西北联大的联立与分设，可以说全由国民政府有意为之。值得提及的是，战时国民政府

严密控制学校教育事业，其时人们称之为“统制管理”。直至抗战胜利后，时人在评析战时高等教育应变发展时，虽多加以肯定，但对此种专制手段大加批评乃至抨击。如前引欧元怀的文章即有如是不满言辞：战争爆发后，“政府为了配合政治作风，有意或无意地逐渐走着统制管理的道路，甚至于大量扩充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教育部的人数增至在二倍以上”。此种“统制管理”，于战时高校而言，其表现除“统一考试”“统一课程”和“试编大学用书”外，最严厉的措施即在于“划一行政”“统制教员”和实施“训导制度”。其目的自然在于，借此等举措实行统一控制！自是而后，直至国民党政权败亡大陆，一直“企图走着统制主义的路线”^⑩。

（四）组合西北联大各校自身存在的矛盾

自1938年4月成立，至1939年8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强令解散，西北联大存在时间仅1年又4个月。该校分立的原因，从某种角度上讲，与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不无一定的联系。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现象，若多校组合而没有矛盾和门户之见，才属不正常！而于此点，既往有关研究认为，各校间的内部矛盾是导致西北联大分立的主要因素，但由前文所述不难看出，西北联大无论“合”与“分”，皆是政府行为也是政府作为。因此，可以这样说，各校间存在的矛盾，应该算是促使西北联大分立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更可以说，它是西北联大分立的一个导火索，促进了该校解体的进程。

西北联大毕竟是几个院校临时捏合在一起的、比较庞杂的战时“大”学校，“原各校之间门户之见、派系之争，闹独立性者是常有之事”^⑪。加之，组建西北联大的部分领导人之间不和睦，内部也存有分立的想法。如工学院李书田自1932年接任院长后，一心致力恢复北洋大学，1937年2月，他起草了国立北洋大学分期完成计划，不久即被推为恢复北洋大学筹委会总干事。因此，他虽是西北联大的常委，但分离之心早已有之，同时，他与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是留德同学，他的要求自然得到陈的同情和支持。身为教育部特派员的陈剑脩，本应起维护平衡的调节作用，但他目睹三院校之间各自为政、矛盾重重，他一人单枪匹马，也无济于事。

不久, 以一种躲避责任的心态请辞西北联大常委职务, 转赴陷入战区的湖北省任教育厅厅长^⑧。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西北联大虽是一个整体, 但“各校仍同时挂原各校的校牌, 带原各校的校徽, 无论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⑨。更值得一提的是, 西北联大在西安临时大学与联合大学期间, 虽有形式上的统一, 但各校仍相对独立地组织教学活动, 学生毕业时所发毕业证书上皆有原学校的公章。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曾有这样的记述: “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 也是从北京迁去的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而成的, 设在陕西城固, 但是它们内部经常有矛盾, 闹别扭。蒋梦麟说, 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 互相牵扯, 谁也走不动^⑩。”由此可以看出, 西北联大各校之间确实存有一定的内部矛盾。尤其作为旁观者的国立西南联大的重要人物如蒋、冯等人, 应该说对此种不和谐因素及其必将带来的后果看得更为清楚——这种看得清自然也包括与自己所处西南联大的情形加以比较后的认识成份。所以说, 这些内部矛盾及斗争, 无疑加速了西北联大的分立。

三、国立西北联大的历史功过评析

自新式教育开办以来, 西北地区虽然同其它省区一样积极创办高等学堂, 但由于资源有限, 虽经过30余年的努力, 最终开办的数量屈指可数。抗战全面爆发后, 国民政府适势应变, 为开发西北, 整合高校资源, 于陕西设立国立西北联大。其后, 为发展西北地区的学校教育事业, 国民政府又将该校分开设置, 并将独立后的各校分布于西北各省。抗战胜利后, 同时期创办的西南联大主体复员迁回平津, 而西北联大主体则留在西北大地。因此, 西北联大的设立及分办, 既调整了战时高校布局, 又奠定了西北教育尤其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基础, 为战时更为战后西北地区留下了一个包括工、农、医、师范、法商及综合大学的高等教育体系, 为西北地区教育的进步和提升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一) 战时学校教育布局调整的需要——应时之需

抗战全面爆发前, 中国无论国立、省立抑或

私立大学, 绝大部分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 布局十分不合理。对此, 前文已揭。国联教育考察团也认识到这种不合理的问题, 并为此提出多条建议。其后, 经过多方商议, 国民政府采纳了国联的建议, 并在1936年颁行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规定: “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学校之设立, 应注重地区之需要, 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 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⑪。”

抗战全面爆发后, 为适应战时需要, 国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 命平津两地多所著名高校分别迁往长沙、西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初设在长沙, 1938年2月迁往云南昆明, 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北洋工学院等则直接迁往西北, 落户在地域辽阔而高校稀少的西北地区。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批评中国大学分布不合理问题, 国民政府已在考虑布局的调整, 据战时曾任部长的陈立夫回忆: “我在决定各校迁移地点时, 也会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则”“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 在后方分区设置; 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⑫。”1938年, 国民政府《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 “对于各级学校教育, 力求目标明显, 并谋各地平均发展^⑬。”仅就此即可看出, 国民政府为调整高校在战时的布局, 将西北联大分立的各校散布于西北各省, 其目的即在于借以促进西北地区教育的平衡发展。质是之故, 西北联大无论是合是分, 都满足了国民政府战时教育布局调整的需要, 同时也是高教事业战时应变的重大举措。

(二) 战时高校教育资源整合的需要——必然之举

全面抗战时期, 教育部以战区内学生“不应失教失学, 并当训练各种专门人材, 以应国家非常之需要, 特设临时大学以资救济, 意远旨宏[宏], 洵为国家百年教育至计”^⑭。西北联大前身西安临时大学成立时, 校舍及师资等资源均相当缺乏。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 组建一所大学都相当困难, 若是数所高校均按移迁前分别设立, 仅设备及师资就不可能实现。其时的中国, 有些高校师多生少, 造成资源浪费。西北联大的设立, 使各校的师资皆得到充分利用, 且于图书、设备等可以“抱团取

暖”，有利于减少战时资源的浪费。

民国时期，中国国立及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靠中国政府或省政府供给者，占十分之九以上”^②。因此，西北联大的联设，为战时国民政府节省了一大批经费。更值得提及的是，若在同一地方分设若干大学，则大学教员的教学能力较难充分的利用。此外，各大学之间亦有同一科目分数种课程的情形，若每所大学各自聘请教职员，且编制的课程相互重复，则会浪费部分资源与经费。诚如国联教育考察团所言：“若能尽量取消多数不健全之大学，而代以少数力量充实之大学，则关于提倡研究，发展现在所忽视之学科，改良教员之待遇，造成师生间较亲切之关系等等，自易采行一种高瞻远瞩之政策^③。”因此，西北联大的组建，不仅是战时教育资源整合的必然之举，也是有效之举。这一点从后来分立为多校后，各校之间仍然相互协作合作资源得到有力的反证。

（三）夯实西北学校教育基础的需要——应然之作

抗战爆发前，西部地区有限的高等教育机构大多集中在西南地区，尤以四川省为多。如国立四川大学、省立重庆大学、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等。其它省区，则广西有广西大学，云南有东陆大学、省立云南大学等。反观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极其缓慢，几乎没有一所成气候的高校。有鉴于此，西北联大设立于西安，可以说是西北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历史新起点。抗战期间，西北联大历尽劫难，且在一年多时间内两次转迁，却坚持办学，传承薪火，为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战时及战后高等教育的持久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历史基础，同时也为西北地区教育的发展构建了基本框架。

组建西北联大各高校的西迁及西北联大各部分在西北的分立，使高教事业基础极为薄弱的西北地区，早在抗战后期就有了极大的改观和发展。据1940年7月间的一份统计材料显示，其时，西北境内高校已计达10所，其中大学1所（国立）、学院6所（国立4、省立2）、专科3所（国立、省立、私立各1）^④。这个数据在战时开办的高校总数中几近1/11。抗战胜利后，西北大学于1946年夏迁回西安办理，并将西北医学院并入；西北农学院成为后来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西北工学院于1946年3月迁至陕西咸阳，解放后与华东航空学院^⑤等合并

为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师范学院除部分师生于1946年6月迁回北平，大部分仍留兰州……至1947年，即抗战胜利仅一年有半，西北地区的高校即增至12所之多，为战前的4倍之数^⑥。由此可见，抗战胜利后，西北联大的主体继续驻留在西北大地，至今在西北办理的高校，除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与西北联大有着直接的源流关系外，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安工程大学等大专院校都与西北联大存在间接的源流关联。

（四）数所“联大”贡献的同异——历史回眸

全面抗战时期，内迁高校借合并以联合方式办学，就联办时间而言，以私立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于1937年10月奉教育部令迁校联办最早；就联办规模而言，则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最著；就联办校名而言，又有西北联大、西南联大、东南联大及华北联大诸校问世。然则，就战时联办成效及对战后历史贡献而言，自然数西南、西北两校影响最显。其中国立西南联大的贡献和影响，人们早有诸多评说，尤其在抗战胜利后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段中更是这样，前者是对西南联大政治斗争的肯定，后者是对西南联大造就人才的褒扬，由是西南联大为世人所“闻”而“扬”名天下。比较而言，西北联大因过早分立，各校散布于西北大地，人们宣传和研究时自然难以“聚焦”。缘此，在今人的心中、眼中，似乎其办学条件、学术氛围及办学环境尤其教育成效及影响方面，西北联大较同时期的西南联大存在相当的差距。然而，征诸历史实际，西北联大亦有所长，尤其对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的推进而言，西北联大的贡献不容后人忽视。限于篇幅，现仅就该校对迁驻地区基础教育后续发展而论。

在抗战胜利后各内迁高校复员之际，西北联大由北平西迁的原北平师大“改装”而成的师范部分，其时已独立为西北师范学院，基本上仍留守西北，这一决然而断的重大举措，对西北地区素来贫瘠的基础教育进步和发展而言，其历史贡献功莫大焉！

民国以来，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一直发展缓慢，水平较低。全面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无疑是一场空前绝后的高等教育事业和知识精英的战略大转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自联立到分设，存在时间

虽短,但组成西北联大的几所院校以其较好的基础和较强的实力,为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打下了持续而坚实的历史基础,缩短了该地区在教育上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虽然西北联大从联立、分设到复员均受到国民政府的干预,各校之间也存有一定的矛盾与斗争,然而该校的存在,确实奠定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历史基础,尤其是陕甘两省的现代高等教育架构。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从抗战前的寥寥无几到如今的燎原之势,西北联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如一掌五指覆盖陕甘大地,通过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传衍,其于整个中华民族教育事业乃至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可谓功在基业千载,泽被西北半壁^④。”早在抗战时期,时人就有预见性地评说:“高等教育机构的内迁,并非一种纯粹不幸之事。因为她们所迁之地,过去在文化上是未开发之区,科学知识观念的传播,有助于推动国家内地的现代化^⑤。”过去的变化已经证实了这种预见的正确,将来的发展仍将证明这种正确的论断!

注释

- ①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编:《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 ②《西安将设临时大学》,1937年9月1日《申报》。
- ③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1895.10—1949.1)》第1卷,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页。
- ④《西安临时大学定期开学》,见《中央通讯社稿》1937年10月上;《西安临时大学月中开课》,见《中央通讯社稿》1937年11月上。
- ⑤李永森主编.《西北大学校史稿》(解放前部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 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 ⑦《西安临大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4月16日《申报》。
- ⑧《徐诵明等到汉报告西北联大状况》,1938年5月30日《申报》。
- ⑨李永森主编:《西北大学校史稿》(解放前部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 ⑩关联芳主编,朱振国编.《西北农业大学校史(1934—1984)》,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 ⑪张建主编:《见证并记录:百年建大老新闻(1895—2006)》(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 ⑫1938年,西北联大的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训令三: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西北联大校刊》1938年第2期。
- ⑬《行政院决议西北联合大学改组为西北大学》,1939年8月9日《申报》。
- ⑭《西北联合大学改西北大学》,《教育通讯》(汉口)第2卷(1939年)第32期。
- ⑮李蒸.《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发刊词》,见《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1939年第1期。
- ⑯周正荣主编.《兰州大学校史·医学编(1933—2004)》,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 ⑰这4人分别为:柏林大学教授前普鲁士教育部长柏克氏、波兰教育部初等教育司长法尔斯基教授、法兰西大学教授耶吉梵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教授明尼氏。其后,在中国加入本团者复有代表国际教育电影社(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Cinematography)之撒狄君(Baron A. Sardi),国际文化合作社(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社长波内(M. Henri Bonnet)二氏。
- ⑱《国联教育考察团建议改革中国教育之初步方案》(上),1932年12月20日《申报》。
- ⑲《国联教育考察团建议改革中国教育之初步方案》(上),1932年12月20日《申报》。
- ⑳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编.《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 ㉑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编.《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 ㉒欧元怀:《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
- ㉓宁夏、青海于国民政府前期相继独立设置:1928年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9次会议决议建立宁夏省,省治宁夏(1941年改称贺兰);1928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决议设置青海省,159次会议上又决议定西宁为省治,1929年1月20日,青海省政府正式成立于西宁。
- ㉔此处西北地区面积和人口数据,抗战全面爆发后所计。参

- 见《西北六省人口面积》，1939年11月26日《申报》。
- ②⑤余子侠，冉春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育研究》，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页。
- ②⑥李友芝、李春年、柳传欣、葛嘉训编.《中国近现代师范教育史资料》第2册（内部交流版），第673—674页。
- ②⑦李永森.《民国年间西北大学三次建校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 ②⑧欧元怀.《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
- ②⑨李永森主编.《西北大学校史稿》（解放前部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 ③⑩参见李永森主编.《西北大学校史稿》（解放前部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8页。
- ③⑪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等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1卷，天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页。
- ③⑫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页。
- ③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87页。
- ③⑭陈立夫著，王云五主编.《战时教育行政回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9页。
- ③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 ③⑯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
- ③⑰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编.《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页。
- ③⑱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编.《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页。
- ③⑲蒋致远主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宗青图书公司1991年版。注：据战时《全国教育统计简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233），1941年（学年度）时，全国高校计有113所。
- ④⑰包括原中央大学航空系、交通大学航空系和浙江大学航空系。
- ④⑱《战后中国的大学教育》，见《教育杂志》第32卷第1号，1947年7月。
- ④⑲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联办的历史解析》，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15年第4期。
- ④⑳韦卓民.《三年来的中国战时教育》（英文），余子侠、郑刚整理：《韦卓民全集》第10卷“教育实录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页。

On the Association and Division of National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Yu Zixia Wang Haifeng

Abstract: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n Peiping, Tientsin (today's Beijing and Tian Jin) experienced a compelled shutdown under the violence of Japanese invaders after the July 7th incident in 1937. In case of interruption of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hiang Kai Shek's government decided to move them inland, thus giving rise to a united university during the wartime like National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The association and division of National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were constantly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Experts' Investigation Deleg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wartime. Therefore, the university experienced a hasty acquisition and abandonment in terms of its identity but its foundation not only kept the essence of our higher education undertakings but also laid a solid histor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especially higher education of the northwest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time.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ll-round; National Foundation;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Association and Division; Success or Failure